

中国历史大讲堂



中国古籍出版社

第五卷

第七章 宋廷南渡及宋、金和战

一、赵构登极，宋室南移

——南宋的建立及李纲之进退

在金兵把徽、钦二帝及后妃、宗室俘虏北去的时候，宋朝嫡亲宗室中只有康王赵构和哲宗的废后孟氏幸免于难。

康王赵构，是宋徽宗第九子，宋钦宗之弟。在金兵第二次围攻开封前夕，他以亲王的身份，奉命同刑部尚书王云一起，出使金朝求和。走到磁州（今河北磁县）时，王云暗中勾结金人、准备挟持赵构去做人质的阴谋被揭露，赵构接受知磁州宗泽的劝阻，没有再北上。但他也不敢留在已是战争前线的磁州，而是掉头跑回相州（今河南安阳），同知相州汪伯彦勾结在一起，逃避抗金斗争。金兵再次围攻开封后，宋钦宗派人夜间缒城而出，委任他为河北兵马大元帅，让他组织河北的宋兵入援京城，但他在河北召集兵马后，却怀着一旦父兄被俘，即另建小朝廷的打算，只顾饮宴取乐，笼络部属，不听从宗泽向京城进发的建议，不肯前去救援京城；后来更把大元帅府由河北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移到离金兵更远的京东路东平府（今山东东平），以避免同金兵接触。

金兵俘虏徽、钦二帝及在京城赵宋宗室北去后，赵构另建小朝廷的时机也到来了。

当时因为金兵从开封撤到河北后，主要力量都用在对付河东、河北宋朝军民风起云涌的抗金斗争方面，无暇顾及张邦昌伪楚政权的命运。京城的朝官和京城外的一些宋朝将官也拒绝接受张邦昌的号令，并对张邦昌施加压力，要他归政与赵氏，复立赵氏为帝。张邦昌成了孤家寡人，不得不表示自己当伪楚皇帝只是“权宜”之计，接着就请哲宗废后孟氏出来垂帘听政，又向拥兵在外的康王赵构上了一道表文，请赵构即皇帝位。

孟氏因为是被宋哲宗废弃的皇后，在宫廷的“玉牒”中没有位号，在金兵围攻开封前夕又正巧所居宫室失火，住在私第中，所以在金兵按“玉牒”俘虏宋朝宗室时得以幸免。张邦昌把她请出来主持朝政后，她就正式下诏旨给赵构，让他“由康邸之旧藩，嗣宋朝之大统”。于是，赵构在假意推辞一番之后，于五月初一日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改元建炎。这个新建立的小朝廷后来被称为南宋，赵构就是宋高宗。

宋高宗同乃父乃兄一样惧怕同金朝打仗。他所信用的汪伯彦、黄潜善二人，也都是些主张逃跑和屈膝投降的人。南宋小朝廷刚建立，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派人去金朝求和，还让臭名昭著的张邦昌写信给粘罕和斡离不，表示小朝廷愿与金朝以黄河为界，把河东、河北许多尚在宋军坚守下的州郡奉手送给金朝。

对于主张抗战、反对向金朝投降的官员，他们则加以排斥。在河北兵马大元帅府任副元帅、坚决主张救援京城的宗泽，在小朝廷建立后就被排斥出小朝廷。只是由于当时投降的时机尚未到来，刚建立的小朝廷也还没有巩固起来，汪、黄二人又都“不饜人望”，对各路军民没有什么号召力，宋高宗还需要一个能孚众望的人物来帮他支撑一下局面，使小朝廷在广大军民心目中有个较好的形象，所以，宋高宗又决定起用因组织开封守卫战而声望很高的李纲担任宰相。

当时鹿集在宋高宗周围的一些投降派人物，因为不理解宋高宗的真意，对起用李纲一事极力进行阻挠。御史中丞颜岐甚至无耻地说：“李纲，金人所不喜。虽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罢之。”高宗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他竟把反对起用李纲的奏疏封好，派人在李纲赴任的途中递给李纲，企图阻止李纲到小朝廷所在的应天府任职：

李纲没有理睬颜岐之流的阻挠，毅然到小朝廷就任宰相职务，并且竭尽思虑，为宋高宗筹划重振朝纲、组织抗金斗争的种种事宜。他针对北宋以来军政腐败的情况，颁布新军制21条，申严赏罚制度；他为了防备金兵的入侵，重新调整了防务部署，在沿江、沿淮、沿河建置帅府，又把州郡分为要郡、次要郡，各固定驻扎一定数量的军队，以资防守；他还在沿江、沿河着手建造战舰，操练水军，以期在反抗金兵入侵的战争中发挥宋军的优势。鉴于当时南宋小朝廷刚刚建立，正规军还来不及整编，还没有成为一支足以抵挡金兵大规模进攻的力量，李纲又坚决主张支持两河军民的抗金斗争，并决定在河北设置河北招抚司，在河东设置河东经制司，委任张所、傅亮分别担任河北招抚使、河东经制副使，拨给钱钞，让他们去河北、河东招募当时各地奋起的义兵，抗击金兵。

李纲在以巨大的努力，着手进行抗金斗争部署的同时，还在下列几个重要问题上，同投降派展开激烈的斗争：

一是对金的和战问题。高宗及汪、黄一伙幻想用对金朝屈膝投降的办法，来换取金朝对刚建立的南宋政权的承认，虽然他们并不真正想让徽宗及钦宗回到南宋，但他们却以探望和迎请被俘北去的二帝为幌子，不断派使者带着奇珍异宝去奉献给女真贵族，向金朝试探投降的可能性，他们还以二帝被掳在金朝，非和议则会使二帝遭害这种堂而皇之的口实，压制坚持抗战的主张。李纲则认为，对金朝退让只能助长女真贵族的凶焰，“今日法勾践尝胆之志则可，法其卑辞厚赂则不可”，主张“一切罢和议”，“专务自守之策”，认真整修战备，以期三年之后能打败金兵，“雪振古所无之耻”，争取二帝不待迎而自回。

二是对待伪楚皇帝张邦昌的处理问题。高宗及汪、黄一伙因为害怕得罪金人，也想利用张邦昌作为他们同粘罕等女真军事贵族联系投降事宜的桥梁，不但不惩办张邦昌丧失民族气节、同金人合作的罪行，反而吹捧他“知几达变，勋在社稷”，加封他为太傅、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颜岐更无耻地说：“邦昌，金人所善，虽已为三公，宜

加重平章事，增重其礼”。李纲则坚决要求宋高宗严惩张邦昌以快人心，表不自己与卖国贼不能并立，若不惩办张邦昌，自己就坚决辞职。

三是关于定都在何处的问题。汪、黄等人主张放弃故都开封，把都城迁到有长江之险可恃的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市）。李纲则认为开封是宋朝“宗庙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不应放弃，在京城残破的情况下，可先在长安、邓州、襄阳三城市中选择一个地方作为临时都城，待开封修葺完毕，即迁回开封。

在围绕上述三个问题所展开的斗争中，只有处置张邦昌的问题，因为张邦昌实在声名狼藉，宋高宗只好部分同意李纲的要求，把张邦昌降职流放。其他重大问题，宋高宗不仅不支持李纲，反而对李纲的坚持感到厌烦，后来更同汪、黄一伙相互表里，破坏李纲的抗金设施。黄潜善唆使其同伙张益谦，胡说自置河北招抚司，河北“盗贼愈炽”，要求撤销招抚司。李纲给予有力的驳斥，宋高宗却让张益谦“分析”，继续陈述其谬论，实际上对张益谦表示支持。河东经略副使傅亮出发才十多天，汪、黄等人却已经诬蔑他“逗留”不前，还逼令他在无所准备的情况下即日渡黄河到金兵占据的河东，实际上是要置傅亮于死地。李纲据理力争，宋高宗也不明确表态，反而无端罢了傅亮。这时，殿中侍御史张浚更充当汪、黄的打手，诬蔑李纲治通敌分子之罪“有伤新政”，攻击李纲反驳投降言论是“杜绝言路”，整顿朝纲是“独擅朝政”，给李纲横加上十多个罪名，要求罢李纲的官。

这种种情况，使李纲感到自己在小朝廷中已不能有所作为，不得不提出辞职要求。宋高宗也顺水推舟，仅仅让李纲担任75天宰相，就以“狂诞罔俊，谋谟弗效”等无中生有的罪名，于八月十八日罢了李纲的官。李纲的一些抗金部署也被破坏。继傅亮被罢免后，张所也因“罪”被贬，河北招抚司和河东经略司都被废罢。

建炎元年（1127）十月，宋高宗带着他的宠臣们，从应天府沿运河逃到扬州，宋廷终于由北方南移。

二、“出师未捷身先死”

——宗泽联络义兵守汴的事迹

在李纲被逐出南宋小朝廷后，继续举起鲜明的抗金旗帜、同投降派做坚决斗争的人物，是年近七旬的老将宗泽。

宗泽，字汝霖（1059—1128），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他从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以同进士出身登上仕途后，虽然长期郁郁不得志，但他却关心国事，以“名节”自恃，还作赋表达了自己“老当益壮，自任以天下之重”的雄心。在金兵第一次围攻开封撤退后，他被召到朝廷当谏官，在朝廷内一再发表抗金主张，驳斥投降言论。在金兵第二次围攻开封时，他在河北表现了同宋高宗一伙截然不同的态度，曾率军孤军奋战，抗击过金兵。南宋建立后，他又以鲜明的抗金立场，为李纲所知，于建炎元年（1127）六月被李纲推荐到故都担任开封府尹，不久又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

开封这座曾经举世闻名的繁华都市，经过金兵的洗劫，这时已经疮痍满目，楼榭尽废，残破不堪。各路来到这里的勤王兵，既没有人统一指挥，也没有军纪约束。整个开封的社会秩序异常混乱，物资奇缺，物价飞涨，人民不得安生。

宗泽一到开封，就立即着手整顿开封的秩序，处死一批曾勾结金兵抢掠残害居民的恶棍，严禁盗窃及哄抬物价的活动，使开封居民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

鉴于当时开封的宋朝军队数量不多，又都是各路临时招募来“勤王”的乌合之众，既无训练，又无纪律，单靠这些军队，不可能保卫开封以抵挡金兵的再次入侵，宗泽就把注意力放在团结中原地区的抗金义兵方面。经过他的努力，王善、丁进、王再兴、李贵、杨进等许多义兵首领，都投到了宗泽的麾下。云集在开封一带的义兵，据说有180万之多，开封的军势一时大振。

在安定人心和团结义兵的基础上，宗泽积极营建开封的防务。在开封城的四壁，都设有统领守御使臣，负责守御一定的区域，招募来的义兵则分属四壁的统领守御使臣管辖。在开封的四周，根据不同的地形，建筑了24个坚固的壁垒，各驻兵数万，以保卫开封的外围。沿黄河南岸，则建筑了一层一层像鱼鳞那样的连珠寨，每个寨都派兵驻守；同时，还挖了许多深广各丈余的壕沟，沿壕沟设障碍物，以阻止金朝骑兵的进攻。在宗泽的悉心经营下，开封这么一个坚固的防御体系，只用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就于建炎元年十月修建完成了。开封完全改变了宗泽刚到时那种“欲战则无兵可凭，欲守则无粮可因”的情况，成了抗金斗争前线的一个军事要塞。

建炎元年十二月，金兵分三路再次南侵，东路自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渡河攻山东，西路自同州（今陕西大荔县）渡河攻陕西，中路由粘罕亲自率领，自河阳渡河攻河南。粘罕在占领汜水关（在今河南巩县东）后，率军向开封进逼。东路金兵渡河后，也由兀术分率一支金兵，从东面指向开封，企图同粘罕配合，一路夹攻开封，一举拔掉这个要塞。但是，由于宗泽沉着指挥，宋军和义兵奋勇作战，开封的防线固若金汤，金兵夹攻开封的计划被粉碎了。

因为开封保卫战的胜利，开封这个要塞继续屹立在中原大地上，使女真贵族不敢越过它纵兵南侵。粘罕虽然攻破了河南几个州郡，终于被迫撤回河东。东路金军在攻占山东几个州郡后也停止了攻势。宗泽经营的开封防线，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宗泽整修开封的防务，不仅是为了守卫开封，主要还是力图把开建成收复两河失地的基地。他也深知，两河失地不恢复，开封“虽有备御，未易可居”。所以，他在营建开封防务的同时，还积极派人联络两河坚持抗金的义兵。

当时的两河地区人民，因为不堪忍受金兵的烧杀抢掠，到处燃烧起抗金斗争的烽火。许多地方的人民组织义兵，占领山谷险要，保卫乡里，据守山寨，同入侵的金兵展开斗争。其中最突出的，有河北五马山寨义兵，河东红巾军，太行山的“八字军”等三支。

五马山寨（在今河北赞皇东）从靖康元年起就竖起了抗金义旗。最初是赵邦杰在那里率众抗金。真定府（河北正定）失陷后，有个叫马扩的将官上山与赵邦杰联合。北宋灭亡后，有个自称是宋徽宗之子信王赵榛的人，说自己是在被押往金国途中逃跑出

来的。马扩就把他接上山寨，推为首领，以赵氏宗室的旗号团结其他义兵。两河许多分散的义兵都同五马山寨互通信息，响应五马山信王号令的义兵达数十万。这股义兵在艰苦条件下英勇抗击金兵，多次获捷。

红巾军活跃在河东广大乡村，参加者以红巾为标志，不断袭击金兵。有一次，红巾军在晋东南劫粘罕的兵寨，差点把粘罕活捉。女真贵族为了扑灭红巾军，对平民滥肆杀戮，激起更多的人加入红巾军的行列，红巾军的声势也更加壮大。他们不仅抗击金兵，还打击那些帮助金兵残害人民的“国贼”。1966年初，在山西灵石县东的绵山半山腰的一个石缝里，发现一个当时义兵藏下的铜罐，其中有一件抗金文件说：“尽事韦家首下国贼之人，尽皆斩尽杀绝，方事报仇”。南宋的投降派也很害怕在出使金朝的途中碰上红巾军。

“八字军”是李纲担任宰相期间设置河北招抚司的产物。在招抚司被解散前夕，都统制王彦奉命率岳飞等裨将，以所部7000人渡河收复了新乡。因为遭到数万金兵的围攻，岳飞率部分队伍离开王彦，独自向南转移。王彦率残部突围，转战到共城（今河南辉县）的西山，据险继续抗金。王彦与士卒共甘苦，他的部下为了表示抗金到底的决心，都自动在脸上刺了“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被称为“八字军”。“八字军”在斗争中迅速壮大起来，队伍发展到1万多人。太行山一带的义兵首领傅选等人所率的10余万义兵，都受王彦的号令，互相呼应，多次打败金兵。

两河风起云涌的义兵抗金斗争，使宗泽更清楚地看到了人民抗金武装的力量。他不仅派人去联络两河各山水寨坚持抗金的义兵，还积极声援两河义兵的斗争。建炎元年（1127）九月间，他得知金兵在河北加紧对义兵的进攻，就亲自率兵自游家渡渡河到河北“视师”，表示对河北军民抗金斗争的关怀和支持。两河义兵也纷纷与宗泽建立联系。在建炎元年十月，王彦的“八字军”开始接受宗泽的号令。五马山寨的首领马扩，也于建炎二年（1128）四月，带着“信王”的一个“咨目”来到开封见宗泽，并通过宗泽的介绍，到扬州进见宋高宗。其他许多义兵也都表示愿意接受宗泽的指挥。

宗泽也深切知道，两河分散斗争的义兵，如果得不到宋朝的有力支持，终会遭到失败。而一旦两河的抗金斗争被金兵镇压下去，宋朝将更加难以收复失地。所以，在开封秩序恢复安定后，宗泽就上疏给宋高宗，要求他还都开封，以号令抗金斗争，争取收复两河失地。在他任东京留守的一年时间内，他先后给宋高宗上了24个要求回銮开封的奏疏，这就是有名的24个《乞回銮疏》。在要求宋高宗返都的同时，他还着手作渡过黄河收复失地的准备。在开封保卫战获得胜利后，他更增强了打败金兵，收复失地的信心，渡河收复失地的准备也更加紧了。他在开封对将士作了出征前的动员，妥善安顿了军士家属的生活。他一一派人去同两河山水寨的抗金军民打招呼，约他们做好响应宋朝大军过河收复失地的准备。对于那些被掳在金朝的汉人，宗泽则派人到金朝占领的州郡张贴榜文，让他们伺机行动，迎接宋兵过河。在渡河作战的部署就绪后，宗泽于建炎二年五月上疏给宋高宗，提出了六月出师渡河的计划，要求宋高宗当机立断，回开封指挥这一北伐的壮举。

这时的宋高宗，却正在扬州同他那一帮宠臣一起，过着偷安岁月、醉生梦死的生

活。对宗泽在开封的抗金部署，他们从一开始就设置障碍，百般阻挠。他们对宗泽在开封声威日著，也很不放心。他们不仅不理睬宗泽的出师计划，还准备派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仲荀到开封任东京副留守，让他监视宗泽的行动。

宗泽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准备好的渡河收复失地的计划难以实现，不禁悲愤交加，终于积忧成疾，疽发于背，于建炎二年六月间病倒了。他在病榻上对前来探望的诸将沉痛地说：“我因为‘二圣’（指宋徽宗、宋钦宗）蒙尘难返，积愤成疾。诸公若能为我歼灭同仇，以成主上恢复之志，我虽死亦无恨”。这席话，使得病榻前的诸将都感动得流下眼泪，表示愿意尽力同金兵作战。

当前来探望的将官们退出以后，宗泽心涛汹涌，他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想起一片忠心描绘成的出师宏图已成泡影，不觉含着热泪，吟起了杜甫《蜀相》诗中的名句：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建炎二年（1128）七月十二日（或作初一日），这位不顾七十高龄，为抗金斗争顽强奋战的老将，用最后一口气连呼三声“过河”，就与世长辞了。

宗泽死后，宋高宗派投降派的杜充继任东京留守。杜充到开封后，把宗泽的抗金设施肆意破坏。宗泽召集起来的义兵，也因为不满杜充的倒行逆施而纷纷散去。金兵曾经一度不敢轻动冒犯的开封，又丧失了抵御金兵的能力，不久就自动放弃给金朝。两河的义兵，除了王彦的“八字军”转移到南宋境内外，五马山寨等义兵的斗争，因为得不到南宋的支援，在金兵的围攻下也先后失败。金兵大举入侵江淮，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三、兀术江南失利，张浚陕西败绩

——宋、金对峙局面的逐步出现

宋高宗及其宠臣在打击李纲、宗泽等抗战派人物的同时，还打击各地人民的抗金，武装。他们诬蔑义兵是“盗贼”，并发布诏令宣布：凡“以勤王为名，擅募民兵、溃卒者，并令遣散”，正式宣布取缔各地自行组织起来抗金的义兵。凡不愿自动解散的义兵，他们就派兵去镇压。一些与义兵有过联系的州县官，也被以“与贼通”的罪名横加诛杀。而对女真贵族，他们却卑躬屈膝，不断派使臣去乞和求降。有个使臣傅雾，甚至无耻地跪在云中金军的帅府中，听金朝元帅右监军完颜希尹的训责，并无耻地就两河军民抗金事向金朝道歉。

宋高宗等人的这些行径，既自毁抗金斗争的长城，也更助长了女真贵族的气焰。建炎二年（1128）年底，金朝见宗泽死后开封的防御设施已经瓦解，南侵再无后顾之忧，大举向江淮进犯。金太宗吴乞买还下了一道讨伐赵构的诏令，命令金军擒拿赵构，要“穷其所往而追之”。宋高宗及汪伯彦、黄潜善等人却还在扬州做着太平梦，对金兵的

入侵不闻不问。建炎三年（1129）二月初，金兵在一个夜间奔袭扬州，宋高宗在淫乐时听到金兵攻到扬州的急报，吓得魂不附体，急忙起床仓皇单骑逃出扬州，渡江逃到镇江。金兵因为尚无渡江南侵的准备，在扬州大肆抢掠烧杀后就后撤了。

宋高宗在镇江等待从扬州逃出的百官赶到，又仓皇逃到杭州。因为汪、黄二人在扬州遭金兵洗劫后更加声名狼藉，宋高宗不得不忍痛把这两个人罢免，任朱胜非为宰相，御营司都统制王渊同签书枢密院事兼都统制。将官苗傅、刘正彦同王渊有宿怨，对王渊的升任不服，又听说王渊同平日作威作福的宦官康履有联系，以为王渊的升迁是勾结宦官的结果，出于对王渊和宦官的怨愤，遂于三月间在杭州发动兵变，杀了王渊、康履及许多宦官，迫使宋高宗让位给三岁的皇太子，让隆祐太后孟氏（即哲宗废后）垂帘听政。这就是所谓“苗刘之变”。

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虽然是出于对王渊的私怨这一原因，但是，他们发布的榜文揭露“奸臣误国，内侍弄权，致数路生灵”，在金兵入侵时“无罪而就死地”，指责“大臣内侍等，不务修省，尚循故态”，宋高宗“信任中官，赏罚不公”，却反映了当时军队中许多将士对宋高宗一伙腐朽奢靡的不满和反对逃跑投降的情绪。

由于兵变的组织者苗傅、刘正彦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也没有谋略，在南宋的大臣和将官中得不到广泛支持。当反对兵变的吕颐浩和张浚率兵压向杭州的时候，他们完全不知所措，又请宋高宗复位，兵变宣告流产。不久，苗、刘二人逃出杭州，在福建被韩世忠俘获，押回杭州处斩。

“苗刘之变”被扑灭后，宰相朱胜非引咎辞职，吕颐浩被任为宰相，张浚任知枢密院事。宋高宗鉴于在扬州差点被金兵俘获的教训，又从“苗刘兵变”中看到将士的不满情绪，不得不在表面上作了一些改弦更张的姿态，下令把江宁府（今南京市）改名建康府，于四、五月间离开杭州，把行都移到建康府，表示要在这里号令江淮一线的抗金斗争，并下令在江淮一带开沟引水，以阻挡金朝骑兵。他还委派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授予张浚全权到陕西组织抗金斗争。但是实际上，宋高宗却没有放弃向金人求降的主意。他一到建康，即派洪皓为“大金通问使”，让洪皓带信给粘罕，表示愿意去掉皇帝的尊号，用金朝年号，作金朝的藩臣。这一年八月，宋高宗听说金兵又将南侵，急忙派人送信给粘罕，说自己从北方逃到南方，“所行益穷，所投益狭”，“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哀求粘罕“见哀而赦己”，给自己一条生路。真是无耻至极。

女真贵族并没有为宋高宗的哀求所感动。建炎三年（1129）九月，金军在兀术的率领下，向江淮大举进攻，准备一举消灭南宋。宋高宗急忙把守卫长江的重任交给从开封逃回的杜充，让隆祐太后从建康向江西方向逃跑；自己则逃回杭州。金兵也分成两路。一路自黄州（今湖北黄冈）渡过长江，东向攻陷洪州（今江西南昌），准备俘虏隆祐太后。另一路由兀术亲自率领，自马家渡渡江攻占太平州（今安徽当涂），进逼建康府。杜充在金兵渡江前不认真作御敌部署，在金兵进逼建康府时即急忙乘船逃到江北的真州（今江苏仪征县），随即向金兵投降。金兵遂占领建康府，并向杭州挺进，准备活捉宋高宗。

宋高宗见金兵向杭州追来，即接受宰相吕颐浩的建议，慌忙从杭州逃到越州（今

浙江绍兴)；又逃到明州(浙江宁波)，从明州下海逃到定海，顺海路向南一直逃到温州。兀术追到杭州后，就在杭州驻扎，并派兵尾随宋高宗追到明州，乘舟入海追赶。

由于金兵不适应海上的战斗，入海追赶的金兵被宋兵打败。江南卑湿的气候和河湖纵横的水乡地理，金朝骑兵也不能适应。兀术见捉拿不到宋高宗，又恐孤军深入被切断退路，就在江南大肆搜掠一番后，宣称“搜山阅海已毕”，用舟船载着抢掠的财物，于建炎四年春离开杭州，沿运河北撤。入侵江西、湖南的金兵也跟着撤回北方。宋高宗见金兵撤退，才从温州返回越州，升越州为绍兴府，作为小朝廷的临时所在地。

当兀术的船队撤到镇江时，宋将韩世忠及其夫人梁氏早已率大批战舰在那里等候。兀术到金山龙王庙察看地形，差点被韩世忠的伏兵所俘。金兵的船小，又不习水战，无法同韩世忠相抗。韩世忠指挥宋军，梁氏亲自击鼓，使兀术遭到惨败。金兵被围困在黄天荡达48天之久，兀术全军陷入绝境，派人向韩世忠表示愿放弃所掠夺的财物，并赠送名马，换取一条撤退的道路，也遭韩世忠严厉拒绝。后来有个奸细告诉兀术，说只要挖开已堵塞的老鹳河故道，就可以通秦淮河。兀术发动全军连夜挖通50里老鹳河故道，才从秦淮河逃到建康。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黄天荡之役。

兀术在建康又大肆抢掠并纵火烧城。但在撤到静安时，早已在牛头山埋伏的宋将岳飞尾随其后追杀，金兵又遭到沉重打击。由于另一金将挾懒派兵前来接应，兀术又利用韩世忠轻敌大意，利用无风海舟不能行驶的时机，用小船以火箭烧毁了韩世忠从镇江赶来建康江面截击金兵的海舟，金兵才得以从江南撤回北方。

兀术自渡江南侵失利后，一直心有余悸，从此不敢再入侵江南。金朝统治者也从这次失利中吸取教训，改变了对南宋战争的策略，一方面派秦桧作为内奸潜入南宋朝廷内部，进行诱降和破坏抗金斗争的活动，一面在黄河与淮河之间的中原地区立汉奸刘豫为伪齐皇帝，建立一个同南宋之间的缓冲地带。金朝对宋用兵的重点，则由江淮转移到陕西，准备攻占陕西，以解除对巩固金朝在两河地区统治的侧面威胁。

建炎四年(1130)秋，宋高宗对金兵的动向作了错误的判断，以为金兵又将渡江南侵，在准备再次逃跑的同时，又命令川陕宣抚使张浚出兵牵制金兵南下。张浚这时虽然已经从投降派营垒转到抗战派的行列，但他志大才疏，又刚愎自用，从建炎三年秋到陕西后，一心只想“大举”反攻，却不曾认真整顿军政及训练军队，又对不赞成他的“大举之策”的将官进行打击，使得陕西宋将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当他接到宋高宗的错误命令后不顾一切，集中陕西五路宋兵数十万人，于九月十四日在陕西富平(今陕西富平县北)，同金兵进行“会战”。

在会战以前，张浚和许多宋将都自恃有优势兵力，以为可以稳操胜券，地形没有认真选择，阵列没有好好布置，“人虽多，营垒不固，千疮万孔”。金兵看到了宋兵的弱点，利用宋兵的骄傲轻敌情绪，待到宋兵因骄傲轻敌而松懈斗志时，才发起攻击，很快就把宋军营垒冲乱，有的宋将临阵脱逃，数十万人马仅仅会战半天，就全线溃败而逃，大量军用物资丢弃给金兵。这就是所谓“富平之战”。

金兵在富平稍事休整后，向陕西内地发起全面进攻。因为宋军从富平溃败后，一直向后奔逃，张浚也只带亲兵一千多人，一口气退到蜀口的兴州(今陕西略阳)，又从兴

州逃入四川的阆州（今四川阆中），南宋军队在陕西全线瓦解，到绍兴元年（1131）三月，陕西五路基本上为金兵所占领。

接着，金兵向蜀口的前哨据点和尚原（在今陕西宝鸡西南）进攻，企图拔除这个据点，进而占领蜀口，打开入川的通道。

和尚原的守将吴玠，是个有勇有谋的将领。在宋军因富平之败而向川蜀溃逃的时候，他却认为，坚壁重兵扼守和尚原，金兵就不敢冒险轻进，是保蜀的良策，遂招集散亡之将士数千人，同将官们歃血为盟，誓死守卫和尚原。从绍兴元年（1131）三月起，金兵一再向和尚原进攻，都被吴玠率将士击退。这一年十月，兀术率军数万人（一说十几万人），连营三十里，再犯和尚原。吴玠率诸将利用险要地形，用劲弓强弩向来犯之敌“番休迭射”，经过二天连续激烈的战斗，金兵全线溃败，几乎全军覆没，兀术本人也身中两箭，带伤狼狈而逃。宋兵获得了金兵入侵以来最辉煌的一个胜利。

在这以后，金兵虽然曾在饶风关（在今陕西洋县东）打败过吴玠，占领了宋军自动放弃的和尚原，却在仙人关（在今陕西凤县、略阳交界处）遭到吴玠更加沉重的打击，始终不能越过蜀口一步。宋、金双方一直在蜀口进行拉锯战。

兀术入侵江南失利后金朝对宋战争策略的变化，张浚组织富平会战失败后陕西五路的丧失，金兵争夺蜀口的失败，这些事件使得宋、金双方出现了一条沿秦岭至淮河的比较稳定的战线。以后宋金战争尽管继续进行多年，战线也有所变动，但始终没有改变沿秦岭、淮河一线相持的格局。因此，这三个重大事件，是宋金战争相持局面出现的标志。

四、“壮怀激烈”，英雄饮恨

——岳飞的抗金斗争和宋高宗、秦桧的叛卖行径

兀术自江山北撤后，宋高宗利用金兵暂时放松对江南军事压力的时机，同汉奸秦桧勾结起来，加紧进行对金投降的活动。

秦桧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在靖康之祸发生时，他正在朝中为官，曾经发表了激烈的抗战言论，反对金兵立张邦昌为皇帝，被金兵拘押北去。但是，他一到金朝就原形毕露，很快卖身投靠女真贵族，成了金太宗之弟挾懒的亲信。建炎四年（1130）十月，他带着其妻王氏，从涟水军（今江苏涟水）航海到越州（今浙江绍兴），来到南宋朝廷，声称自己是杀掉金朝的监视人员，夺舟而来的。当时南宋许多官员都认为秦桧的说法破绽百出，对他的来历感到可疑。但宋高宗在见到秦桧，听了他的“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的鼓吹后，却喜出望外地说秦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得意地说自己“又得一佳士”，很快就于绍兴元年（1131）八月任命他为右相兼知枢密院事，让他负责对金“解仇议和”的活动。只是由于这时金朝尚无同南宋议和的诚意，秦桧在拜相前吹嘘只要他任宰相数月，必“耸动天下”，结果却无所作为，使宋高宗感到失望。秦桧按照金朝的授意，露骨地向宋高宗建“南人归南，

北人归北”二策，要南宋将河北人遣送给金朝，中原人遣送给刘豫的伪齐政权。因为当时不仅宋高宗本人是“北人”，许多文臣武将和士卒也都是北方人，按此二策办理，不仅南宋政权和军队都要解体，宋高宗本人也将无所归，所以宋高宗尽管投降心切，但也不能接受此二策。左相吕颐浩及一些朝官也对秦桧进行弹劾。宋高宗仅任秦桧为相十个月，就把他罢免，并榜其罪于朝，示不复用。

在秦桧于绍兴二年（1132）首次罢相后的几年中，金朝虽然放出了“和议”的空气，但条件比通过秦桧提出的二策更加苛刻，除要南宋把“西北士民之在东南者”通通遣返外，还要南宋把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划给伪齐，使南宋失去淮南的屏障。这种“和议”实际上是金人消灭南宋的一种策略。南宋如果接受这些条件，连偏安江南一隅都不可得。所以宋高宗尽管对金统治者“卑辞厚礼”在所不惜，但却难以接受金人的条件，宋金的“和议”没有什么进展。

在军事战场上，从绍兴初年后，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金朝兀术继和尚原之败后，绍兴四年（1134）三月，又在仙人关遭到吴玠同样沉重的打击，不得不放弃入蜀的打算。在荆湖一线，宋将岳飞于绍兴四年五月至七月主动出击，收复了被伪齐占据的襄阳等六郡，使西北战场的防线同两淮战线的联系保持畅通，南宋的防御力量得到加强。兀术率军支援伪齐，于九月间伙同刘豫大举渡淮南侵，遭到岳飞、韩世忠所率宋军及两淮许多水寨义兵的英勇抗击，很快以失败告终。这一切说明，宋金战场的形势从绍兴四年起已发生了有利于南宋的变化。金兵在战争初期的军事优势消失了。南宋已在战争中锻炼出吴玠、韩世忠、岳飞等英勇善战的军事统帅，南宋军队的战斗力也已大大加强了。

绍兴初年金朝在诱降及军事方面的种种失败，使金朝内部在对宋战争的策略方面产生严重分歧。绍兴五年（1135）金太宗死后，女真贵族内部的矛盾更发展成激烈的内讧。扶植伪齐的粘罕失势，刘豫这个汉奸头目成了金朝对宋战争失利的替罪羊，伪齐于绍兴七年（1137）被金朝废掉，以挾懒为首的一派当权的女真贵族决定把原由伪齐管辖的河南、陕西交还宋朝，同宋朝议和。

金朝因内讧引起的对宋战争政策的剧变，在南宋小朝廷内部引起巨大的反响。宋高宗认为多年盼望的“和议”又有了希望，重新起用秦桧为宰相兼枢密使，让他专决“和议”之事。南宋内部许多人都认为金人不可信，反对“屈己”与金朝讲和。这样，在南宋内部，抗战派与投降派之间又展开一场激烈的斗争。这时期抗战派的旗帜，就是抗金英雄岳飞。

岳飞，字鹏举（1103—1142），河南汤阴人。他出身农家，在北宋末年从军参加征辽战争。南宋初，他曾作为河北招抚司的下级将校，随王彦渡过黄河到河北抗金。离开王彦后，又投到东京留守宗泽的麾下参加开封保卫战，为宗泽所赏识。他在宗泽面前论阵法，提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见解，更为宗泽所赞赏。宗泽死后，岳飞又随杜充从开封撤到建康。当杜充在兀术渡江南侵时畏避逃跑乃至无耻投敌的时候，岳飞却率所部孤军奋战。兀术从江南撤退时，他又在建康附近奋勇追击，并收复建康城。这时的岳飞，已经经历了大小200余战，因英勇善战，声誉日高，很快升任独当一面的将领。当绍兴二年他刚30岁的时候，已经成了守卫长江中游的主帅。在绍兴四年

(1134) 他受命挥师北伐，夺回伪齐控制的襄阳六郡后，被封为节度使。这时他刚 32 岁，成了南宋大将中最年轻有为的一员。他所率的“岳家军”因纪律严明，战功显赫，深受人民爱戴，成为南宋抗金斗争的中流砥柱。

岳飞的南征北战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支配他的行动的思想，不仅有对宋朝尽忠的思想，还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一心想打败金朝、收复失地，迎回徽、钦二帝，洗雪靖康亡国之耻。他 30 岁时曾写了《满江红》一词抒发自己的激情：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首词虽然暴露了岳飞的忠君思想和狭隘的民族情绪，但主要是反映了“壮怀激烈”，不以功名为意，一心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收复襄阳六郡后，他从六郡残破的情况，联想到故都开封及金兵铁蹄践踏下的北方人民的苦难，更加满怀悲恨，在一次登黄鹤楼时又填写了《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一词：

遥望中原，苍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寿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声歌作。到如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青锋铎。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劲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正因为岳飞有恢复失地，出民水火，振兴宋室的素志，所以，他一面极力要求宋高宗出师“直捣中原，恢复故疆”，一面联络河朔抗金的义兵，作收复失地的准备。

但是，岳飞的雄心壮志却不是遭到宋高宗的冷淡对待，就是遭到阻挠。宋高宗只想偏安江南，并不想取得抗金斗争的胜利，因为一旦打败金朝，迎回徽、钦二帝，自己就做不成皇帝了。所以宋高宗只允许岳飞守住已经相对稳定的防线，却不使他超出襄阳六郡的范围去收复更多的故土。在绍兴四年出师收复襄阳六郡时，宋高宗就给他明确的命令，让他严格限在被伪齐李成夺去的襄阳六郡范围，不得过分深入敌境，以免引惹金人，否则，“虽立奇功，必加尔罚”。绍兴六年（1136），岳飞再次受命北伐，虽然所向披靡，但因宋高宗下了不许直捣中原的命令，又不督促其他大将出兵应援，岳家军被迫撤回原地。绍兴七年（1137）二月，岳飞应召进见宋高宗，向高宗面陈规复之策。宋高宗不仅不置可否，连原先已作出的把淮西刘光世军并给岳飞、让岳飞尽力“中兴之事”的决定，也在一瞬间取消了。宋高宗不仅没有赏识岳飞的忠心，反而对他产生了疑忌。

这种种情况，使得坚决抗金的岳飞同以宋高宗为首的投降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岳飞不仅没有像宋高宗对他的要求那样，当一匹可供任意驾驭的温顺良马，反而因为感

到恢复中原的宏愿难以实现，于绍兴七年夏愤然向宋高宗提出了辞去帅职的请求，并且不等宋高宗批复，就自己到庐山守其母之丧，以表示自己对恢复中原宏愿得不到支持的失望和愤懑。

当绍兴八年（1138）宋高宗起用秦桧为相，授予秦桧同金朝议和的专决大权时，岳飞表现出激烈反对的态度。当时宋高宗召他从鄂州（今湖北武昌）入朝，企图让他放弃举兵入中原的主张，附和投降活动。岳飞却尖锐地说：“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国（指秦桧）谋国不臧，恐貽后人讥”，要求宋高宗停止对金的“和议”。当宋高宗同秦桧沆瀣一气，于绍兴九年（1139）正月不顾一切，同金朝订立和议，向金朝称臣纳贡后，岳飞不仅没有按例向宋高宗敬献贺表，反而上表对宋高宗说，同金和好，“图暂安而解倒垂，犹之可也；顾长虑而尊家国，岂其然乎？”表示自己口诵议和的诏书，“面有惭于军旅”，“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这实际上是一篇继续坚决抗金、反对投降的檄文。当宋高宗因庆贺“和议”成功而给诸大将加官晋爵时，岳飞却认为，“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只能训练将士，严加防备，“而不可行赏论功，取笑夷狄”，再三力辞不受。

岳飞这种坚决反对“和议”的态度，使宋高宗甚为恼怒，更为秦桧所切齿，从此被宋高宗和秦桧视为眼中钉。但是，事情却正如岳飞所预料的那样，在“和议”订立不久，金朝又一次发生内讧，兀术以挾懒把河南、陕西地归宋，告发挾懒同南宋有秘密勾结，挾懒被夺了军权，不久又被以谋反罪处死，对宋战争的急先锋兀术掌握了军权，立即撕毁绍兴九年正月同南宋订立的“和议”，并于绍兴十年（1140）五月，分兵两路，向陕西和河南大举进攻，很快又把河南、陕西夺了回去。

接着，兀术率大军向淮南大举进攻。宋高宗这时又慌了手脚，急忙下诏让岳飞从襄阳出击，牵制向淮南及陕西进攻的金兵，并“图复京师”（开封）。但是，进攻淮南的金兵却在顺昌（今安徽阜阳）遭到刘锜所率原“八字军”的沉重打击，兀术不得不撤回开封。金兵对淮南的威胁很快就解除了，宋高宗也马上改变主意，立即向岳飞下了“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的命令。岳飞却认为机不可失，坚决向中原进军，一路受到中原人民的热烈欢迎，岳家军所至克捷，收复了许多州郡。七月间，岳家军在郾城（今河南郾城）大败金兵，歼灭了兀术的精锐骑兵拐子马。接着，岳家军又在颍昌打得兀术狼狈而逃，并一直追击到距开封仅45里的朱仙镇。这时黄河南北许多坚持斗争的义兵都打着岳家军的旗号，响应岳飞的北伐，其他各路宋兵也转入局部反攻，抗金斗争呈现一派蓬勃发展的的大好形势。金兵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兀术甚至一度准备撤离开封，到河北以避岳家军的兵锋。

但是，抗金斗争的大好形势，却吓坏了不愿抗金斗争胜利的宋高宗和秦桧一伙。他们急忙下令各路宋兵班师，使岳飞军处于孤军无援的状况，接着又连发金牌，强令岳飞退兵。岳飞接到宋高宗这种叛卖性的命令后，既十分愤慨，又不能违抗，不禁十分悲愤地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然后无可奈何地下令撤退。岳家军第二次北伐的巨大成果，又让宋高宗、秦桧拱手送给金朝了。

宋高宗、秦桧一伙在强令岳飞班师后，为了向金人表明投降的决心，撤消了岳飞、

韩世忠等大将的兵权，加紧进行对金投降的活动。兀术因为绍兴十一年（1141）初再次向两淮进攻，在拓皋（今安徽巢县西北）又被宋军击败，终于认识到对宋战争已不可能用武力取胜，也表示愿意与南宋议和。宋、金之间为和议又开始了紧张的活动。

宋高宗见和议可成，像岳飞这样的良将已经不仅不再需要，还成了投降活动的障碍，长期的疑忌终于变成了杀掉岳飞的念头。兀术因为害怕岳飞反对和议，也派人授意秦桧害死岳飞。于是，宋高宗同秦桧策划，由附和秦桧的张俊出面，捏造罪名，诬告岳飞准备谋反，把岳飞及其儿子岳云、部将张宪逮捕入狱，交给秦桧的党羽万俟卨（mò qí xiè）用酷刑逼供，要岳飞承认有谋反之意。岳飞知道自己既落入国贼之手，“为国忠心，一旦都休”了，但始终拒绝承认秦桧一伙诬加的罪名。当时宋高宗、秦桧也找不出任何岳飞想谋反的证据。韩世忠替岳飞抱不平，去责问秦桧。秦桧竟说，岳飞父子谋反的事“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听了，不禁愤愤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从此，“莫须有”三字，成了一切反动人物诬害正直人士所使用的卑鄙手段的代名词。

制造岳飞大冤狱，还是宋高宗、秦桧一伙压制其他反对投降的文武大臣、排除投降阻力的一种手段。在逮捕岳飞父子后，宋、金双方终于在绍兴十一年十一月订立和议：南宋正式向金朝称臣，每年纳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宋金东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关（在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中间的唐（今河南唐河县）、邓（今河南邓县）以北地区划归金朝。这个和议因为订在宋高宗绍兴年间，遂被称为“绍兴和议”。

就在“绍兴和议”订立不久，宋高宗、秦桧不顾一切地把岳飞父子及张宪订成死罪，并于绍兴十一年除夕（1142年1月28日），把岳飞、岳云及张宪杀害。当时岳飞年仅39岁，岳云年仅23岁。岳飞在临刑之前，在狱案上挥笔写下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表示了对投降派的最后抗议。

岳飞虽然被诬害，但他的事迹却几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颂。宋高宗勾结秦桧，出卖抗金斗争的胜利果实、用卑劣手段杀害人们所敬仰的抗金民族英雄岳飞，虽然换取了金朝对南宋偏安江南的承认，却永远被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到历代人们的鞭挞。秦桧成了人们最痛恨的奸臣和卖国贼之尤，几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唾骂。在制造岳飞冤狱中起过恶劣作用的张俊和万俟卨，也成了历代人们咒骂的丑类。明代诗人文征明更赋《满江红》一首，直截了当地揭露了宋高宗出于卑鄙用心，勾结秦桧杀害岳飞的丑恶面目：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浪狱！

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日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在杭州的岳王庙和汤阴的岳王祠，几百年来，一直有人在那里缅怀岳飞的功绩，痛斥宋高宗和秦桧一伙的罪行。

五、“便令江汉竭，未厌虎狼求”

——“绍兴和议”后的宋、金和战形势

“绍兴和议”的签订，是南宋以宋高宗为首的统治集团为维持自己的腐朽统治，对女真贵族的可耻投降。通过这个和议，南宋获得了金朝对其偏安一隅的承认。在这以后的20年时间内，金朝集中力量巩固其在北中国的统治，内部也不断发生互相残杀事件，无暇再发动对南宋的进攻。南宋统治者也安于称臣纳贡的地位，每年除把岁币如数送到泗州（今江苏盱眙）交纳给金朝外，还要搜刮大量的金银币绢，送给金朝贺正旦及生辰。宋高宗之母韦氏每年送给金朝皇后的礼物，也“以钜万计”。金朝随时索取各种玩好，宋高宗也下令“搜访与之”。

以宋高宗为首的南宋投降派以为，既然和议订立了，金朝统治者的贪欲又一一予以满足，从此可以安安稳稳地做起太平梦了，于是把战备抛到脑后，在杭州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有个叫林升的诗人，写了一首《题临安邸》诗，悲愤地咏道：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这首诗揭露了南宋小朝廷君臣只顾在西湖夜以继日地肆意享乐，完全不想再恢复故都（汴州）的丑恶嘴脸。

但是，好梦不长。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就把宋高宗一伙的和议幻梦搅破了。

完颜亮是金朝第四个皇帝。他在发动宫廷政变弑金熙宗，登上皇帝宝座后，在金朝进行一系列政治改革，杀掉大批奴隶主旧贵族，在金朝确立了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后，又想使“天下一家”，成为“正统”，于是准备举兵灭宋。他曾派使臣到南宋，偷偷带上画工，画了一幅杭州湖山风景图带回金朝，亲自在这幅画上题诗道：

万里书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
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

这首诗清楚表述了完颜亮想消灭南宋、一统中国的心迹。为了消灭南宋，完颜亮一面下令大规模地调拨军队，建造战船，一面不断指责南宋收纳叛亡，购买马匹，对和议及金朝“多有不诚”，制造举兵的舆论。

对于完颜亮南侵的意图，南宋一些有识之士早就有所觉察。绍兴二十六年（1153），有人上书要求宋高宗及早防备，宋高宗竟勃然大怒，把上书人流放到千里外，并下诏宣布此后有再“鼓倡浮言，以惑众听”者，都要“重置宪典”治罪。到绍兴二